

從東北亞各國互動檢視中韓外交關係

周世雄

(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前言

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五年三月上台後在蘇聯大力推行「開放與重建」政策，間接促成了東歐一九八九年民主化運動，推動社會主義集團之政治改革，同時亦緩和東西陣營在歐洲地區的緊張關係。由於雙方意識形態的縮小，軍事對峙也出現解凍現象。然而一九八九年的東歐民主化風潮，在亞洲却未形成「參考效果」。①中共領導階層對戈氏的民主改革並未領情，甚至更製造出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在東北亞地區除了中共外，民主化運動給北韓的衝擊並不算少，但却未真正影響到北韓政權的改革。

然而一年的光景，東北亞區域性結構却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大韓民國是中華民國在亞洲唯一的正式邦交國，在中華民國的對外關係中，韓國所佔的份量自不待言。而韓國晚近在外交上的積極作為，從韓國的國家利益觀點上看，中華民國做為韓國傳統上的邦交友好國應該給予喝采與肯定，然而另一方面韓國的積極進取却直接震撼中韓外交關係，中華民國政府面對如何加強中—韓邦交這組命題上，恐怕感覺到的壓力不小，必須及早準備。

東北亞區域性的結構變化有肇因於美、蘇超強的和解，也有肇因於地區性角色的獨立自主能力之擴張，及中共、日本、韓國國力之增強。在中韓外交關係上，韓國所掌握的籌碼，及其主動出擊，在在影響中韓外交之發展。是以，本文擬從（一）東北亞區域結構轉變；（二）中韓外交關係之演變；（三）雙方未來因應之道等項逐一檢視現階段中韓外交關係。

註① 周世雄，「東北亞軍事發展近況」，亞洲與世界文摘，（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五月），頁五十。

二、東北亞區域結構變化

東北亞地區除了區域性角色的日本、中共、南韓、北韓，及中華民國外，尚需將美國、蘇聯兩超強包含在內。由於美蘇兩強二次戰後相互牽制，在東北亞地區造就了壁壘分明的兩大集團。因此，在分析此區域內權力結構變化時，很少不把美、蘇的動向列入考量範圍。

(一) 美蘇和解

二次戰後，美國在東北亞地區建立相當良好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係，美國領土雖未座落在此區域內，但因上述各種關係，美國防線實已擴展到西太平洋區。美國的太平洋艦隊經常在此區域巡弋。基於防衛上之需要美國與日本、南韓、中華民國都曾訂立協防條約。美國的目標就是圍堵共產主義，封鎖中共和蘇聯由西太平洋出海至南太平洋。蘇聯在二次戰後乘機攫取日本北方四戰略小島，又夥同中共支援北韓。基本上朝鮮半島上的軍事對峙一直無法鬆動，而日本的國防安全又因北方四島為蘇聯控制而無法擺脫蘇聯的威脅陰影。因此，東北亞戰後的架構實可劃為兩組國家集團的對抗：蘇聯、中共、北韓是一組，美國、日本、南韓、中華民國是另一組。

美、蘇的一舉一動自然影響區域內的任一國家。美蘇開始和解的跡象要追溯到一九八五年雷根—戈巴契夫時代。雷根總統和戈巴契夫於該年十一月十九至廿日在日內瓦舉行高峰會議，共達成了十三項協議，茲舉其重要者如后：②

- (I) 兩國元首在最短期中互訪。
- (II) 雙方不進行核戰與一般戰爭，不尋求軍事優勢。

註② 朱少先，「外弛內張的東北亞情勢」，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五卷，第六期，頁十二。
其他協議條款計有：

- (I) 遵守一九六八年防止核武擴散條約。
- (II) 擴大雙邊交流，發展經貿關係。
- (III) 雙方以合作精神解決人權問題。
- (IV) 恢復美蘇定期民航，在基輔與紐約互設領館。
- (V) 促進國際合作，和平使用熱核融合。

(III) 在研擬有關中程飛彈 (ICBM) 協定和各自裁減核武百分之五十的原則下，加速核武及太空武器的談判，雙方定於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在日內瓦重開限武談判。

(IV) 為減輕核戰危機，雙方同意由專家組成危機減輕中心進行研究。

(V) 致力締結國際協定，全面禁止研製化學武器並廢棄現有化武。

(VI) 強調在歐洲促成互信方案及裁軍之重要性。

(VII) 兩國官員，地區問題專家定期舉行各種層級會議。

(VIII) 尋求日本合作，推進北太平洋航空安全。

由上述十三項協議可知，美蘇雙方對於最敏感的核武問題僅作原則性的宣示，並未深入攤牌，然而雷根和戈巴契夫的努力實際上已加強了雙方外交關係，奠定今後兩國元首進一步會談，同時亦開放雙方走向和解之途。

美蘇外交關係的突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始見端倪。是年五月，美國國務卿貝克 (James A. Baker) 走訪蘇聯外長謝瓦納澤 (Eduard Shevardnadze)。戈巴契夫向貝克明示在下一回合之歐洲傳統武力談判 (CFE) 時，蘇方在數項武器上將着手裁減的數字，正好十分接近北約總部所期望的數字，戈氏的舉動帶給美國國務院官員相當信心，美方咸認為蘇方是有誠意締結利於北約的協定。為了回應克宮的善意，布希總統在北約高峰會議上提出北約傳統武力之裁減以回報。由於雙方互信建立，同年九月，貝克和謝瓦納澤在懷俄明州的第二次會談即成功地營造出蘇方在戰略武器 (START) 裁減上的重大讓步，蘇方同意打開戰略武器裁減談判死結，於翌年 (一九九〇) 之春末或初夏簽署協定。這樣友好氣氛促使布希和戈巴契夫舉行「馬爾他高峰會談」 (Summit at Malta)，而使美蘇關係如兩國元首於會後所言「在一個新時代門檻」。^③

(二) 交叉關係

超級強權的解凍進而促使東北亞各國之多邊互動 (multi-lateral interactions)，形成交叉關係。而在地區性五國和外交來兩超級強權所建構的交叉關係相當複雜，關係組合型式多達數十種，並非本文探討的主線，本文僅以關係中韓外交發展之組合來檢視東北亞地區政局之變化。

(一) 日—蘇關係趨向緩和

註③ Arnold L. Horelick, "US - Soviet Relations: Threshold of A New Era," *Foreign Affairs*, 1989/90, pp. 56 - 58.

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並未立即化解日蘇在東北亞的歧見，日本軍方鷹派人士強調蘇聯在北方的威脅未減，日本應加強本身防衛力量。而歷屆日本政府最關心的是戰後蘇聯佔領的北方四島何時歸還。

一九八八年七月日相中曾根曾訪問莫斯科，蘇方曾宣示願意討論四島問題。同年十二月十八日，雙方就四島（國後、擇捉、色丹、齒舞）主權歸屬舉行第四次會議，但無實質突破。^④翌日，蘇外長謝瓦納澤訪問日本，雙方同意設立一工作委員會，針對「簽訂日、蘇和平條約有關事宜」進行討論。此次會談姑且不論蘇方是否真具誠意，但至少促成戈巴契夫願擇期訪日。^⑤

雖然莫斯科於一九八九年初決定從日本北方四島撤離部分軍力，日本防衛廳仍認為蘇聯在遠東的兵力對日威脅並未減少。日本認為在島上部署的陸軍和四十架米格廿三型戰鬥機仍威脅日本國防安全。^⑥很顯然，日蘇雙方關係在一九八九年底止，雖無積極和解動作，但前嫌冰釋的跡象已露端倪。一九九〇年十月，日本官員透露，蘇聯當局於不久前曾向日本自民黨領袖之一安倍晉太郎表示，蘇聯準備重提一項一九五六年間的建議，以使日蘇兩國關係在完成正常化後，日本將收回北方四島中的色丹、齒舞兩島的主權。此項說法雖經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吉拉西莫夫否認，並謂「與事實不符」。但這樣的說法恐怕也非空穴來風，其含義誠如日外相中山太郎所說：「蘇聯當局提出這項建議是有意着手改善日蘇兩國外交關係。」蘇聯西伯利亞豐富之天然資源未來也許是日蘇雙方關係突破的有利因素。日本財團對此區域內之天然瓦斯、煤、原油、木材、黃金、鑽石早已蠢蠢欲動。目前受制於西伯利亞之基礎建設如鐵路、公路、港口、通訊設備尤甚落後，仍裹足不前。日本政府曾有意提供蘇方經援，但條件是必須歸還前述四島，^⑦足見日元加上西伯利亞之資源將是未來雙方談判之籌碼。^⑧雖然日蘇關係尚未全面和解，戈巴契夫將於一九九一年四月正式訪日，雙方關係很可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發展。^⑨日蘇關係之改善，連帶影響到韓國與蘇聯關係。

由於世界局勢之改變，全球區域性的結構也隨之滑動，如東歐巨變、東西德統一。在東北亞地區，蘇聯與南韓於一九九〇年十月初宣佈建交，北韓和日本也決定於十一月間商談建交事宜，南韓和中共關係也在發展中，交叉承認呼之欲出。

註④ Coit D. Blacker, "The USSR and Asia in 1989," *Asian Survey*, Vol. xxx, No. 1, Jan. 1990, p. 7.

註⑤ *Strategic Survey*, 1988 - 1989, IJSS, Spring 1989, pp. 122 - 123.

註⑥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註⑦ *The Korea Herald*, Dec. 23, 1990, p. 7.

註⑧ 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九日。

註⑨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八日。

(II) 韓蘇關係

傳統上蘇聯對朝鮮半島之外交政策一定要考慮北韓之利益。蘇聯即使是想與南韓接觸也要考慮北韓反應。在這種「牽制」下，南韓盧泰愚政府所推動的「北方政策」想在短期內突破對蘇外交限制，實非易事。跡象顯示，至少到一九八八年底蘇外長謝瓦納澤蒞臨亞洲訪問時，在平壤和金日成會談，雙方在所討論的問題上觀點相當一致。謝氏甚至支持北韓拒絕美國、南韓所提的交叉承認，批評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

蘇聯對兩韓的外交政策十分謹慎，但也不排除與南韓接觸的機會。一九八九年一月，韓國現代工業集團總裁訪蘇，希望討論擴展雙邊經貿事宜，甚受蘇方歡迎。四月，蘇聯商務部派代表前往漢城慶祝在南韓首都設立的雙邊貿易辦事處。三月份，蘇聯政府幕後之智囊機構，國際關係暨世界經濟研究所出面接待韓方政要，顯示雙方的接觸一直在穩定中發展。^⑩

漢城自一九八三年在外交上提出北方政策後，致力和共產集團國家改善關係，蘇聯和中共即被列為主要目標，對於蘇聯及東歐各國，南韓政府近年的努力終獲突破。^⑪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和南韓總統盧泰愚於去年六月四日在舊金山舉行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會晤，儘管雙方並未達成實質上之聯合聲明，但會後盧氏說明雙方會談很有成果，南韓與莫斯科正邁向建立外交關係之途，並將在經濟、科技、文化領域擴大交流與合作，同時將北韓請到會議桌上，以維繫東北亞和平。戈巴契夫也表示：

「雙方共同努力以摘取成熟果實」的強烈暗示，使得雙方改善關係，甚至邁向建交之途更形明朗。^⑫

南韓與蘇聯於去年十月建交，其實已承認在朝鮮半島上現存南韓與北韓兩個獨立主權國家。蘇方向為北韓堅強盟友，也終於瞭解到朝鮮半島問題之解決辦法是先承認領土分裂之事實。盧氏旋於十二月十四日與戈巴契夫共同發表「莫斯科宣言」

(Moscow Declaration)，規範兩國未來雙邊外交關係發展之重要原則。其內容如下：^⑬

- (一) 互相尊重主權平等，領土統一，政治獨立，互不干涉雙方內政，承認各國自由選擇政治、社經發展之道。
- (二) 恪遵國際法原則，及聯合國憲章之目標與原則。
- (三) 禁止以武力或威脅手段加諸他國以達維護本國安全。
- (四) 有關國際爭端或地區性衝突必須由所有當事國同意進行政治性協商，以代替威脅或使用武力。

註⑩ Coit D. Blacker, *op. cit.*, pp. 10-11.

註⑪ Young Whan Kihl, "South Korea in 1989," *Asian Survey*, Vol. xxx, No. 1, Jan. 1990, p. 73.

註⑫ Shin Jae Hoon, "Susumu Awanohara, Perestroika Pay-off,"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4 June, 1990, p. 10.

註⑬ *The Korea Herald*, Special Report 2, Dec. 21, 1990.

(五) 發展各國互助合作，增進了解。

(六) 參與國際社會之裁減武器競賽及核武或傳統武器。

(七) 建立安全穩定之國際社會，保障人類進步。

由於南韓和蘇聯外交關係的突破，很明顯在東北亞投下變數，整個區域也將有關鍵性轉變。盧戈會談的歷史性意義及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本文不擬贅述。但其影響東北亞地區各國的互動關係，同時證明「北方政策」已獲致階段性成果，值得重視。

(Ⅲ) 北韓—日本

日本和北韓最近之接觸可以算是北韓自東歐民主化運動以來首次衝破孤立封閉之格局。一九九〇年九月廿六日日本前副首相金丸信(Shin Kanemaru)率團前往北韓會見金日成。在會談中，金丸信先就日本過去殖民統治朝鮮半島向北韓道歉，並且親自遞交日相海部俊樹(Toshiki Kaifu)以自民黨總裁名義寫給金日成的道歉信函。雙方並就日本道歉及賠償問題達成基本協議，金日成也同意日本要求釋放被北韓以間諜罪而扣押的兩名日本船員。^⑭日方除了對北韓所提據稱約五十億美元的賠償金仍持保留態度，另外建議在兩國首都設立直撥電話，及直航定期班機。北韓方面則希望日方刪除護照上所載「在北韓地區通行無效」字樣。^⑮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與北韓進行第三次高層接觸，雙方談話內容為賠償及北韓核武設施。日方不同意北韓所提必須賠償一九一〇—四五年間日本佔領(殖民)北韓期間之損害。日方同時懷疑平壤正在發展核武。儘管雙方歧見仍未解決，但平壤已指派副外長田仁徹全權負責對日磋商建交之事。同時日方亦同意雙方執政黨於一九九〇年九月在北平簽署協議。^⑯

日本—北韓關係之突破當然受到南韓—蘇聯關係正常化的影響，日本甚至不希望落到南北韓互動之後。北韓突然間的轉變方向固有其他原因，但受蘇聯的壓力及中共半開放政策的影響是其主因，蘇聯經濟失控也直接警告北韓必須向共產世界以

註⑭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第十版。

註⑮ Charles Smith, Shim Jae Hoon, "Crack in the Glaci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7 Sept., 1990, p. 10. (有關討論賠償問題，日本仍需顧慮南韓的反應，日本和南韓於一九五六年關係正常化時，日方僅付五億美金予南韓，且引用的條款類似補償基金，但北韓一口氣要求五十億美元，且必須引用正式戰爭賠償原則。)

註⑯ *The Korea Times*, Dec. 22, 1990, p. 1; *The Korea Herald*, Dec. 23, 1990, p. 5.

外的國家尋求技術和資金，日本當然是東北亞地區最佳對象。^⑮

(IV) 南北韓會談

南北韓總理會談亦是朝鮮半島自分裂為兩個國家後史無前例的創舉。雙方提出改善關係及促進和平統一的建議，部份見解相同，但歧見仍多。南韓的建議着重於加強互信交流及改善關係，北韓則着重於政治和軍事問題上。

雙方意見一致的部份包括：應停止彼此詆毀、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在雙方設立電話線，推動裁軍，限制大規模軍事演習，廢除非軍事區沿線的防禦工事，原則上同意目前的停戰協定須以永久性的和平條約取代。^⑯

南韓總理姜英勳在會談中提出改善兩韓關係八點方案，以及加強雙方交流和合作的十點方案，及建立政治、軍事互信的四點方案，另有執行裁減軍備的五點措施。內容洋洋大觀，顯然是有備而來，發揮南韓「北方政策」至極點。本文僅將南韓所提的改善關係八點建議臚列於后，其餘建議則予省略：^⑰

- (甲) 雙方在統一之前，互相承認並尊重對方的政治、社會制度。
 - (乙) 雙方停止對對方進行誹謗，不干涉對方內政。
 - (丙) 經由對話及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與糾紛。
 - (丁) 不得從事任何顛覆或推翻對方的企圖。
 - (戊) 雙方共同努力，實現自由往來及各方交流合作，互相開放社會及恢復血緣聯繫。
 - (己) 建立軍事互信及裁減軍備，停止軍備競賽及軍事對抗。
 - (庚) 停止在國際場合不必要的競爭及對抗，彼此合作促進大韓民族的利益與自尊。
 - (辛) 共同努力將現行軍事停戰協定轉為和平制度，以利和平統一。
- 基本上，北韓總理延亨默提出的建議則顯得缺乏說服力，北韓認為互信只有在裁軍及統一後才能建立，而且南北韓在聯合國共享一個席次，停止美韓聯軍每年舉行一次的「團隊精神」(Team Spirit)聯合軍事演習，以及釋放因訪問北韓而遭

註⑮ 同註⑮，p. 11.

註⑯ 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六日。

註⑰ 同註⑯。

監禁的政治犯。^⑳

北韓之所以派遣總理赴漢城，大致上是受到莫斯科和北平的壓力所致。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於去年九月二日訪問平壤之前，先抵達哈爾濱會見中共外長錢其琛，達成共識，維持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謝氏於翌日再轉往平壤，要求北韓與南韓談判。很明顯，在南北韓會談這棋局中，北韓後台老闆——蘇聯和中共確實扮演決定性角色。^㉑由於強權介入，加上區域中的南韓兩造本身對統一之訴求，使得東北亞政局進入快速轉變期。

由美、蘇、日、中共、兩韓之交叉互動可以獲致初步結論，朝鮮半島之交叉承認很可能於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前達成。其原因大致如下：（一）日本已開始和北韓商討改善雙邊關係及建交事宜；（二）中共和南韓關係已有突破；（三）美國雖與北韓保持距離，但因東北亞結構轉變，未來對北韓政策亦會調整。^㉒

三、中韓外交關係之演變

（一）傳統外交關係

由於地緣政治、歷史、文化等因素的支撐，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一向具有極密切的友好關係。兩個國家的外交關係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上。中韓兩國都是二次大戰後的分裂國家，經濟上又呈現平行式的競爭成長，政治上都反對共產主義的擴張。理論上，兩國擁有的共通性，可以把兩國的密切關係稱之為「兄弟之邦」。但自一九七三年六月韓國發表「門戶開放政策」改變以往堅決反共立場，並尋求與社會主義國家搭建關係，中韓外交關係出現新的變化。

大韓民國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正式宣告成立，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聯合國以四十八票對六票通過大韓民國為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元月承認大韓民國，並於七月派遣大使赴韓。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中韓兩國政府有感於共產主義的威脅，乃決定共同抵抗共黨勢力的擴張。整個一九五〇年代中韓外交關係誠如李承晚總統率外交部長於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廿七日抵台北訪問，並發表聯合公報所言：「中韓兩國重申為

^⑳ Shim Jae Hoon, "A Single Step,"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3 Sept., 1990, p. 11. 按北韓現有一百萬兵力，南韓為六十萬，北韓提議雙方裁減五十

萬人。第一梯次裁減卅萬人，第二梯次裁減廿萬人。簡單計算，第二波裁減後，南韓是符合北韓要求已減至十萬兵力，但北韓似乎仍坐擁五十萬兵力。

^㉑ *Ibid.*

^㉒ *The Korea Herald, Special Report 1, Dec. 21, 1990.*

自由而戰之堅定信念，和對共產侵略繼續作殊死戰之決心。確信在亞洲戰勝共產主義，實為世界和平與安全之鎖鑰。中韓兩國願與亞洲其他自由國家團結一致，組織反共聯合戰線，以抵禦共產國際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之侵略。」雙方強調中韓一家，唇齒相依，關係密切，必須同舟共濟維持相互友好關係。²³

由中韓兩國領袖倡議，一九五四年三月中、韓、越、泰、菲五國，和琉球、香港、澳門地區代表匯集韓國鎮海，決定成立「亞洲人民反共聯盟」。²⁴綜觀整個五〇、六〇年代，鮮明的反共旗幟成為貫穿中韓兩國外交關係的主軸。

(二) 中韓外交之轉變

從歷史的發展過程看，中華民國和大韓民國的關係可以傳統友誼稱之，這種關係植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共同利益。但是共同利益有了轉變，或加入新的涵義，則會影響到既有的外交關係。中華民國在一九七〇年代仍堅守反共原則，南韓則已注入「門戶開放」新意。進入一九八〇年代，韓國很明顯已逐漸尋求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各種機會。同樣在中共方面似乎也有一拍即合之勢。鄧小平上台後，中共亦採「門戶開放政策」，希望從西方工業化先進國家引進科技與資金，以便完成現代化，首先與美、日修好，韓國和中共的關係逐漸有了新方向。

一九八三年是中華民國與韓國外交關係在形式上不變，但實際含意已經變質的一年。五月的「劫機事件」，韓國並未將六名劫機者交予台北，中共方面派出民航局長沈圖前往漢城交涉歸還人機事宜，造成南韓與中共卅餘年的首次官方接觸，由於該事件順利解決，中共事後同意與南韓進一步進行體育、學術、文化等非政治性的交流。六月韓國外長李錫範更明確指出，八〇年代韓國外交最重要的目標是防止朝鮮半島戰事重起，爾後韓國外交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是如何營造有利的外交環境，實現與蘇聯、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北方政策。²⁵顯然，韓國基於國家安全（國防）的考慮，思藉拓展與蘇聯、中共外交關係，以牽制北韓南下的野心，中共成為南韓外交上爭取的主要對象，當然給中華民國、韓國外交關係投下不穩定因素。

一九八五年，中共一艘魚雷快艇駛入南韓，希望轉赴台灣。韓國最後並未送到台北，也未交給第三國，仍循前例，人船交還中共。中華民國政府針對一九八三、八五兩次事件，一直保持低姿態，希望中韓間的歧見能在正式外交關係中消除，即使是一九八七年年底，盧泰愚總統公開表示南韓希望和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台北也未見任何抗議行動。²⁶十二月廿七日

註23 朱松柏，「中韓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二十六卷，第十一期，民國七十六年八月，頁十四。

註24 同註23。

註25 同註23，第十二頁。

註26 Steve Bih-rong Liu, "Taiwan-South Korean Relations: A View From Taipei,"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 Sociology*, Taipei, No. 13, Dec. 1989, p. 84.

，在韓國總統盧泰愚揭示外交方向後的三天，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鄒堅會晤韓國外長，對韓國與中共建交之事表示關切。

一九八八年二月，韓國新任大統領就職典禮，俞國華院長率特使團前往祝賀，希望加強進一步的了解與合作，俞氏宣稱中韓關係仍相當穩定和重要。然而儘管中方的努力仍無法改變韓方既定的北進政策。雙方外交上的摩擦似乎有逐漸演變成外交危機的趨勢，雙邊的誠信減少，而不滿却日漸增加。²⁷

盧泰愚總統在一九八八年的新年記者會上曾指出：「老朋友就如年數已久的葡萄酒一般，越老越醇。」然而盧氏又表示：南韓外交政策的基本態度是，只要對韓國有利，不論什麼國家，他都願意前往訪問。²⁸盧氏所指的老朋友可能是美、日、中華民國，而後者當然是蘇聯、中共或北韓了。從這種「一刀兩刃」理念可以了解到南韓在對華政策可能採取的態度。很顯然，過去中韓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密而實」的關係已失去意義。近年來，南韓重要官員訪問台北已少見，即使有之，所採取的方式也傾向「噤聲式」或秘密訪問，官階也不對稱。前述俞院長祝賀盧大總統，是以院長身分出使，反觀韓國派來台北祝賀李總統就職典禮的官員似乎顯得差距太大。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二日，南韓外長崔光洙在國會外交與統一委員會演說，首次以「中國」稱呼中共。崔氏表示：「鑒於韓國和中國的關係已發展到某程度，這是我們認真檢討韓國和台灣關係的時候了。」翌日，中華民國政府向韓方提出抗議。七月廿三日，南韓外長宣稱，改善漢城與北平的關係，將不會妨礙漢城與台北的外交關係。²⁹韓國急於推動北方政策，由此事件可見一斑。對一個和韓國有正式邦交的國家而言，漢城輕率地違反國際禮儀，似乎隱喻台北在當時也可稱呼大韓民國為南韓，而以高麗人民民主共和國替代北韓。這樣的籌碼對台北而言也是相當可貴，只是可掌握的時間並不太長。因為南北韓在二年三個月後即突破僵局，舉行總理級會談。

在中韓外交發展過程中，中共成爲最重要因素。從中共南韓近年關係發展即可發現爲何台北和漢城的外交關係會每況愈下。茲臚列數項重要外交事件如下：³⁰

- (I)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韓國總統當選人盧泰愚表示就任後將優先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
- (II)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四日，南韓總統全斗煥表示漢城奧運會後，會促進與「中國」的關係正常化。
- (III)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南韓與中共研商互設具有領事功能的中央政府管轄的貿易辦事處。

註27 Ibid.

註28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八日，第三版。

註29 聯合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

註30 同註29。

(IV) 一九九〇年二月六日，南韓外務部表示藉亞運在北平舉行的機會，與中共改善關係。

(V)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南韓外長崔浩中在電視訪談中，公開且首次建議與中共及蘇聯外長舉行會談，商討彼此建交問題。

(VI)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三日，南韓為配合北平亞運，將致力與中共建立領事關係。

(VII)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鄧小平會晤北韓金日成，提出不與南韓建立官方關係的四項原則。

(VIII) 一九九〇年六月八日，盧泰愚希望會晤江澤民，但中共外交部重申暫不與南韓發展官方關係。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日，中共第一次公開證實，北平和漢城就互設民間貿易聯絡處將展開接觸，雙方將於適當時間設立此一貿易機構。中共外長錢其琛也一改以往教條式說法，表示中共 and 南韓維持較密切關係將有助於減輕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錢氏於二月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時證實，中共和南韓近年開展了民間往來和相當規模的民間貿易，是有助於推動朝鮮半島局勢繼續走向緩和與穩定。^{③1}

從一九八七年底起至一九九〇年十月止，南韓很明顯朝著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的目標前進，而中共於一九九〇年二月雖曾表示暫不與南韓發展官方關係，十月即傳出互設民間性質的貿易機構。中共若非顧慮與南韓建交意味承認兩個韓國政府，而被援引到台灣問題上，南韓的努力很可能早已見到成果。

然而事實顯示，南韓希望短期內能與中共建交，目標將不會輕易改變。一九九一年元月盧大統領又明確宣示希望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表現出韓方的急迫感。南韓也開始與北韓會談，南韓的外交空間頓時增加，而因為中國問題因素，中華民國與韓國的正式外交關係必須做彈性調整，始能應付即將面臨的考驗。

中共對韓國的態度可以「又愛又恨」形容之。中共希望能透過與韓方交往而切斷中華民國與韓國之關係進而孤立台灣。雖然目前中共領導階層企圖穩定內部秩序，對外有意維持與北韓的穩固關係，但是面對南韓，中共仍不斷改善雙方關係，成為公式化模式，^{③2}擴大雙邊經貿往來，企圖「鈎吊」韓方胃口。

註③1 中國時報（台北），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四日，第十七版。

註③2 羅昌柱，「韓半島周邊情勢與北方政策」，第十二屆韓中學術會議論文，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十頁。（羅昌柱博士，北方政策研究所所長，羅文承中山大學韓國僑生劉中岳部分譯解，一併致謝。）

四、結論暨雙方未來因應之道

從東北亞整個架構下檢視中華民國和韓國的外交關係可知中韓外交關係的轉變實隨著東北亞區域政治的變化而律動。而東北亞局勢的演變又為國際體系的運作所制約。因此，美蘇超強的和解、冷戰的結束反射到區域性的國家角色，造成原來壁壘分明、旗幟鮮艷的集團或聯盟（Alliance）政治漸趨模糊。意識形態的重要性日漸萎縮，各國的對外關係大部份會以「國家利益」與「實用原則」為考量因素。

中韓外交關係很難孤立來看，它涉及美蘇在東北亞利益，中共的統一策略，北韓與南韓競爭，日本在東北亞的影響力等錯綜複雜因素。這些國家形成一個關係互動網。因此，當南韓致力於與蘇聯、中共建交之際，一旦蘇聯首肯，南韓和北韓的談判則能進行，南北韓愈早統一，台灣就無機會以北韓牽制南韓。當中共基於現實的需要，而同意與韓國發展非官方關係，這樣的安排必然是考慮如果造成「二個韓國」，「一個中國」原則就很難自圓其說。日本當然不會坐視南韓北方政策之推動功效，也希望分別與蘇聯、中共、北韓解決歷史上的歧見，日本給韓國的壓力必然使韓國加緊追擊，最後又反饋到中韓外交關係上。

韓國政府在短期內仍將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式外交關係，但另一方面基於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的考慮，勢必努力推動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關係，這個模式顯然已成爲韓國當局的既定政策，如何使雙方維持傳統友誼，又能各自發展，實爲兩國政府應當認真研究的課題。

面對公元二千年，中韓外交關係在東北亞體系滑動之際，中華民國實應有計畫的調整對韓政策，未來雙方關係仍有努力之空間：

（一）雙方除了外交層面的合作外，應加速兩國人民經貿、體育、文化、學術等非政治性交流。中韓曾有過密切關係，雙方人民瞭解亦勝過其他國家。在經貿政策上力求化解惡性競爭而爲良性互補合作，在亞太區域組織中相互提携，共同扮演一建設性之角色。

（二）中華民國對南韓之北方政策若從南韓立場來看則較易化解雙方歧見。反之，南韓政府若能從中華民國立場考量亦能諒解我方態度。韓方可能不瞭解與中華民國加強關係實對韓方有利之奧妙處。誠如我國駐韓大使金樹基先生的說法：「我國對韓國立場已有瞭解，本人使韓甫滿三月，曾會晤盧大統領等政治領袖，雙方溝通管道通暢，一般而言，韓方朝野對我國甚爲友好，但基於自身安全不得不調整其對外政策。目前北方政策已達成其階段性目的，韓國既已與蘇聯建交並與中共協議互

設商務代表處，在此情形下，蘇聯與中共應不致支持北韓南侵，韓國安全上可無慮，再者中共考慮與北韓關係，目前亦難進一步與韓國發展政治關係，故韓國實不必再急於與中共建交，畢竟保持與中華民國外交關係是韓國與中共談判的最佳籌碼，對韓國最有利。」³³這樣務實且具突破性之訊息，透過雙方學術交流或官方適當管道傳達韓方，也許有冷卻韓國—中共建交熱度。

(Ⅲ) 我國對韓外交關係應及時研擬因應對策，根據我國外交部對外非正式說法，未來對韓關係絕對有更務實的作法，似乎反應出我國已做好準備工作。

(Ⅳ) 在國際舞台上互相支援。台灣目前受制於「中國問題」，活動空間較小，但未來如能順利解決「中國內政」，其發展空間自然擴大。

(Ⅴ) 中韓雙方在現有基礎上互相尊重對方，以不妨害對方之原則下，各自發展外交空間。台灣應加速與蘇聯、北韓接觸，從民間交流開始，減少隔閡，擴大與社會主義國家交往空間。

(Ⅵ) 美國支持韓蘇高峰會談很顯然已支持南韓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全面外交關係，其用意與支持日本完成國防獨立自主相似，證明美國在尋求東北亞局勢的緩和後，將儘早撤出駐日、韓美軍。在東北亞地區，日本、韓國(南)及中華民國除意識形態相近外，政治、社會、經濟體制亦屬同質，未來可以共同合作，填補美、蘇超強留下的空間，以維繫東北亞地區穩定與和平進而與東協國家合作，創造真正的太平洋盆地世紀。

註³³

作者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廿四日上午於漢城與金樹基大使訪談紀錄。

從東北亞各國互動檢視中韓外交關係